

0296.3

(总第七十一辑)



- 要 ● 万国权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 我所知道的陈长捷
- 目 ● “大跃进”中的天津耐火器材厂 ● 我的篮球生涯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方兆麟

执行编辑:张 柱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张笑平

张敦书(特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6·3(总第七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长安路 189 号)

天津武清县长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5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706-9/K·351

定价:5.2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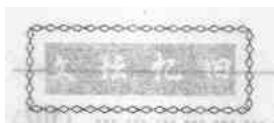
1996·3(总第71辑)



- 万国权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 安 扬(1)
对资改造中的代表人物乐松生 安冠英(9)
天津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王 成(24)
“大跃进”中的天津耐火器材厂 黄 新(39)
记津门首家国营大型零售商场
——天津百货大楼 朱家琦等(55)



- 我所知道的陈长捷 贾文波(67)
曹锟家族轶闻 曹继宗(87)
段祺瑞在马场 贾润泉(95)



- 忆天津海风社及诗人邵冠群 余秋阳(102)
二三十年代风靡平津的口琴演奏 赵嘉理(108)
李世芳的艺术生涯(下) 宋培予 姚宝璠(114)

EL30728

小迷子(李桂春)生平 甄光俊(136)



我的篮球生涯 李震中(144)
国立体专在天津复校纪实 张长江(172)



一生挚爱是中华
——记爱国归侨许乃波 梁智梅(176)



袁世凯堂妹反对其兄称帝 袁家豪(94)
天津“堤友”篮球队琐忆 张长江(143)

封面照片说明 (107)
天津“堤友”篮球队 张长江(143)
袁世凯堂妹反对其兄称帝 袁家豪(94)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40周年。40年前对资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现发表《万国权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等三篇史料，以兹纪念。



万国权在工商业 社会主义改造中

◇ 安 扬 ◇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万国权这样说：“公私合营后，利中酸厂走上了新阶段，这是企业的新生，也是我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爱国民族工商业者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历史的抉择中选择了接受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成长为人民的公仆。在这些人物当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古老的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天津利中酸厂经理万国权和天津市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庆祝这历史性胜利。当时的利中酸厂是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家制酸工厂，规模居于全国第二位，生产的硫酸在军需民用方面是重要的原料和产品。当时国家急需硫酸，硫酸在市场上又是抢手货，它的利润远远超过其他行业，如将其产品全部投放市场，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1950年万国权代表利中酸厂资方与国家签定了包销合同，将产品全部交国家包销，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道路。有人对万国权的这一作法很不理解，说：“放着大钱你为什么不赚？”万国权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利中酸厂产品旺销的局面是共产党给带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报效党和国家呢！”

万国权说的是实际情况。“九一八”事变后，一些爱国人士激于爱国热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寄希望于兴办工业，提倡国货，以达到强国富民抵制外侮的目的。万国权等人在1932年筹建天津利中酸厂，1934年正式投产，为股份制企业。利中酸厂投产后，日商就在华北市场以低价投放了大量硫酸，妄图挤垮利中酸厂。在国人爱国热情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利中酸厂挫败了日商的阴谋。不料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了天津以后，强行霸占了该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利中酸厂被国民党政府接管，直至1947年才发还，但这时的工厂被毁坏得难以生产。天津解放以后，利中酸厂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才得以恢复生产并有了发展。历史教育了万国权，他懂得了工商业者只有跟党走才能走向光明。

促使万国权代表资方将工厂产品全部交国家包销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政治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

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赁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我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初、中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初、中级形式，即工业接受国家加工定货，产品交国家包销，商业进行统购统销等。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更高级形式。

1950年万国权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他在民建组织的帮助下，认真地学习《共同纲领》，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唯物辩证法，世界观逐步发生了变化，懂得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认识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明确了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决定把国家急需的硫酸全部交国家包销，支援国家建设，工厂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道路。这是利中酸厂的重要转折，为工厂的公私合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万国权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是他由原工商业者逐步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人民公仆的新的关键性的起点。

利中酸厂转成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以后，国家给以大力扶持，工厂缺少资金，国家给贷款；缺少原料和器材，国家帮助解决，使一个在解放前奄奄一息的工厂，到1953年硫酸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25%，生产、经营空前发展。

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1952年万国权代表利中酸厂股东就向天津市财委会申请公私合营。为创造条件，工厂主动解决生产器材问题，把最后一个铅室换成新的，为扩大厂址，又买进已歇业的大成化学厂作为扩建基地。

1953年党和政府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年9月7日，毛泽东主席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份代表谈话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10月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召开，11月中国民建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两个会议共同的中心议题是号召工商界和各自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

万国权积极学习和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工商业者广泛宣传工商联、民建两个会议精神。同时在利中酸厂的股东中做了大量工作，再次使董事会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形式。万国权作为资方代表，与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企业公司代表经过数次协商，于1953年11月双方签定了公私合营协议书。在清产核资中，万国权代表资方提出资产清估清册，双方密切配合，实事求是，使每项清产估值都做到了公平合理，既没让国家吃亏，也没让资方吃亏，得到了上级的好评。1954年1月1日，利中酸厂正式公私合营，万国权出任副厂长，他和工厂全体职工敲锣打鼓举行庆祝大会，祝贺利中酸厂的新生。

利中酸厂公私合营后，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形式；对万国权来讲，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他说：“公私合营后，利中酸厂走上了新阶段，这是企业的新生，也是我的新生。”从此他继续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在一起，向自食其力劳动者目标前进着！

利中酸厂公私合营后，职工生产情绪大为高涨，各生产小组纷纷提出追加计划，降低消耗的保证。其中矿炉小组改变加料时间，增加落炉次数，创造了生产上的新纪录，由日烧5吨料提高到5.5吨料，并将2小时续一次料改为1小时续一次料，使矿炉温度保持正常，而且矿石烧得干净，炉灰的含硫量由3.4%降到2.8%，节约了硫化铁矿石。蒸浓房小组工人和技师一起解决了跑酸气的问题，

使日产量由 193 罐提高到 214 罐，蒸浓房的蒸浓炉过去每月大修一次需六七天，合营后只需三四天，这样出硫酸的时间比以前大大增加。利中酸厂公私合营的当年增建矿炉 14 个、除尘室 1 座、铅房 1 座、格氏塔 1 座，产量增加 1 倍，极大地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

该厂在公私合营前，技术人员和工人关系不密切，工人技术水平不能够提高。公私合营以后，技术人员提高了觉悟，为此 1954 年 2 月 29 日《天津日报》报导：“该厂技术人员决定将铅房车间的分析化验工作教会工人，使工人能够从理论上了解生产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节约硝酸用量。”“工人们在掌握了分析化验工作以后，很快就在车间建立了自己做分析化验工作的制度。以前每周才化验一两次，现在每天每班工人就化验一次。”对节约硝酸用量起了很大作用。在铅房车间，由于技术人员和工人密切协作，很快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难题。如旋管，过去因温度高经常坏，每修理一次需停工四五个小时，经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改进后，使盘旋管降低温度 20 度，延长了盘旋管的使用时间。

《天津日报》于 1954 年 1 月 3 日、2 月 8 日、2 月 29 日、3 月 14 日、4 月 20 日连续报导利中酸厂公私合营以后新气象，在工商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利中酸厂的公私合营，极大地调动了万国权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到处宣传总路线精神，宣传公私合营优越性，并以现身说法介绍经验，很有说服力，在工商业者中间起到骨干、带头、桥梁作用。

1954 年 4 月 30 日，民建天津市分会、市工商联联合举办座谈会，座谈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会上，公私合营北洋纱厂厂长朱梦苏、利中酸厂经理万国权和已经签定了公私合营协议的三五机械制造厂经理王金标分别介绍了经验和体会。万国权着重介绍了公私合营以后改进企业管理、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利润增加和私股代表有职有权情况，具体说明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优越

性。他强调说：“在企业改造过程中，我个人也得到了改造，学会了一些新的管理企业的知识。以前，我顾虑合营后自己的地位问题，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自己肯不肯干。”

1954年5月，民建天津市分会为贯彻总路线精神，协助、配合党完成我国对资改造工作，连续举办了三次关于公私合营工厂工作经验介绍座谈会。朱梦苏、万国权等又分别介绍了经验。他们都以具体事例说明了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优越性，说明公私合营后对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的好处。万国权说：公私合营以后，私股代表3人在具体工作上都有了初步分工，而且有职有权，我们在公方代表的领导和帮助下，懂得了许多新事物。公方代表对私股的正当权益也很尊重，有事和我们商量，我们提的意见，只要正确，都考虑采纳。

万国权在宣传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合营前我有几种想法：利中被批准合营了，很灵敏地就考虑到个人问题，能不能还当经理？能不能还维持原薪？比起政府干部，自己的薪金恐怕要降低吧？企业里有了政府派来的干部，自己要很早来上班，外出要请假，感觉怪不自由的。另外又想到自己不是技术人员，能够干什么？这时的思想复杂极了，脑子里缠绕着这几种想法。在学习和与公股代表谈话中，我懂得了：不是政府要不要你做经理的问题，而是你肯不肯干和肯不肯学的问题。”万国权又介绍说，合营以后，他分管基本建设工作，顾虑摸不到门，但在工作中今天学一样，明天学一样，不懂的就请示研究。他又深有体会地说：“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肯不肯学的问题。”又说：“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我不成呢？”在谈到“自由不自由”时，万国权说：“有人认为合营了，在工作时间内就不能自由出来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对于厂里职务当然应很好地负起责任来，但政治和业务的有关活动，像参加民建的活动和工商联的工作，不仅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公股代表是很支持的。”

万国权发言声音宏亮,说话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在场的人都深受教育。一次在天津市五区区委统战部召开的重点工商户座谈会上,万国权以生动的事例介绍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华威钟表厂曲安州听了以后解决了思想顾虑,立即申请公私合营。曲安州看到民建会员学习机会多,对问题能分析,看得透,因此也积极要求参加民建会。这些关于公私合营座谈会,《天津日报》都给予详细报导,在天津工商业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民建、工商联各自召开会议,号召成员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党实现总路线,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

民建天津市分会和市工商联组织成员深入学习、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万国权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宣传。随着我国对资改造的全面开展,到1955年底,已掀起高潮。1956年1月7日,天津市工商界参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队成立,总队长为李烛尘,副总队长为周叔弢、朱继圣等。万国权积极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和其他队员一起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按区、行业深入到工商业者中去进行广泛宣传,培养和训练骨干分子;协助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造规划、人事安排、清产核资等工作;调查研究各行业生产经营情况及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意见;推动辅导各行业工商业者保证搞好生产经营,积极接受及协助进行改造工作。

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和工商业者积极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准备工作,1956年1月9日,天津市私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1月15日,天津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私营工

业全部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高级形式。在这历史性的转变中，万国权配合党和政府为天津市的对资改造作出了贡献。这一天，在天津市第一、二工人文化宫，为庆祝天津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举办了职工和原工商业者联欢晚会。晚会上，万国权无比激动，兴致勃勃地演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牧虎关》，搏得全场阵阵喝采和热烈掌声。

1956年2月，在天津市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万国权发言，对自己人生中的这极其重要的转变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总路线公布以后，利中酸厂被批准合营了，一切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又一次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认识到为什么要改变生产关系，应当为谁服务等重要问题。”同时，他决心“今后一定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守职尽责，积极地参加合营后的改组、改造工作，向群众学习。克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逐步学会用社会主义管理原则来管理企业，同时，在工商界当中起带头作用，抓紧时机学习本领，积极为人民立功。我自己除了学习业务之外，还要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国完成对资改造，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论述道：“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又指出，在对资改造中“资本家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万国权和其他先进分子一样，在这一时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建中央宣传部供稿）

对资改造中的代表人物乐松生

1953年，乐松生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给同仁堂带来新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同仁堂指明了方向。”

久负盛名的北京同仁堂创业于1669年，300多年来，为继承和发展祖国的中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创办、经营同仁堂的乐氏家族为振兴、发展中药这一国之瑰宝，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同仁堂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阶段，但真正的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公私合营以后。当时担任同仁堂经理、北京达仁堂国药提炼厂厂长的乐松生先生在此时做出了突出成绩。

一、同仁堂率先公私合营

乐松生出生于1908年，1928年从北京到天津任天津达仁堂副经理，1949年任北京同仁堂经理兼达仁堂副经理，成为北京同仁堂乐氏第13代传人。解放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北京同仁堂在1949年3月就建立了北京市国药业工会同仁堂基层工会。乐松生和工会定期召开劳资协商会，解决生产、销售和职工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

义工商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乐松生和同仁堂职工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同时，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交通恢复，市场对中药的需求量很大，乐松生和职工共同努力，大幅度地增加了丸散膏丹和药酒的产量。到1950年底，同仁堂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而且产量、销量都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劳、资双方收入都有大幅度增加。这使乐松生受到很大教育，他从心里认识到只有在新中国，民族资本才有发展前途。热爱党、热爱新中国成为他的基本政治态度。

1950年6月25日，美国悍然出兵侵略朝鲜，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美国出兵朝鲜，乐松生震惊了，他不由得回忆起先辈讲述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同仁堂的遭遇。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乐家打磨厂新开路住宅兼制药作坊被德国军队强占，家中珍藏的医药典籍以及家具等都被烧毁了，药酒除少量被德军饮用外，酒坛都被打碎了。这期间同仁堂还被迫供应德军一切饮食和日常用品，八国联军还日夜到同仁堂掠夺，喝酒胡作非为，同仁堂损失惨重。现在，美国入侵朝鲜，妄图卷土重来，乐松生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在同仁堂，乐松生与工会一起团结工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他常说：“一个药店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离开了社会和人民，还有什么价值呢？现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要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乐松生任同仁堂经理后，全面继承了同仁堂的配方独特、选料上乘、炮制严谨的传统，同时在管理上废除了家店合一的封建性生产制席，采取了合理的经营管理办法，同仁堂面貌焕然一新。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出于爱国激情，乐松生与同仁堂职工一起学习，制订了爱国守法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与此同时，乐松生与其他股东一起学习毛泽东主席的伟大

号召，认识到必须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去，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股东们委托乐松生全权代理踊跃捐献。

同仁堂原计划按北京市国药业同行公会的4%捐献，另外再多捐2亿元（旧人民币，下同），估计半年可捐献4亿元。为了多捐献，乐松生又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签订了代购代销合同，增加了流通渠道，同仁堂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为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使乐松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为了支援前线 and 支援祖国建设，职工们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同仁堂的产品产量大幅度上升，利润猛增，最后捐献额突破了原有计划，半年共捐献6.9亿元，受到了上级领导单位的表扬。同仁堂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其他各户。

1952年乐松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在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英勇善战、舍生忘死的战斗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乐松生，使他终生难忘。

乐松生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是没有曲折的，他由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成长为国家干部，也经历了痛苦的改造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些不法工商业者唯利是图，采取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和有关工商管理法则。为此，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经历了磨炼。

1951年初，在同仁堂进行过一次清查财产的工作。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有几千斤白酒没有上帐，当然也就没有上税了，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补税。同仁堂的股东们算了一笔帐，如果补税需交大量现金，而这笔补税款远高出买这批白酒的价钱，权衡利弊，觉得补税不上算，就偷偷把白酒倒入地沟里，弄得四邻都闻到了冲天的酒味。

在清查帐目时，还发现同仁堂股东曾抽逃资金伪造假帐。当时同仁堂药店采购药材一般都通过天成药行经手，同仁堂股东就把私存下来的各种细料放在天成药行，然后再从天成药行买回来，重新开张假收据，回同仁堂报帐，而这钱都进了股东的钱囊。

作为同仁堂经理的乐松生，对于同仁堂违法活动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上级党组织和同仁堂职工曾不止一次地帮助乐松生和其他股东提高认识。工人们耐心地对乐松生说：“白酒是国家的财富，是我们工人创造的，你们把白酒倒掉了，不是浪费了国家的财产吗？”

乐松生无言以对，他内心也感到了惭愧。

上级党组织更是多次找乐松生和其他股东谈心：“你们自己比较一下，看看现在的同仁堂比解放前有多大发展？你们自己再算一笔帐，看看你们的收入比解放前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这都不用算，乐松生心里明镜似的，但他还感到有些委屈：“乐家在解放后不也做出了贡献吗？不也经常受到表扬吗？”

“你们在解放后是有很大进步，但不能以此作为理由来掩盖问题；不能不遵纪守法。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解决问题是为取得更大成绩。”

工人们对于乐松生又批评又鼓励：“有问题就承认，你还是我们的经理。”

水滴石穿，通过多次宣传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乐松生爱国守法的决心增强了，觉悟提高了，这为北京同仁堂在中药行业中第一个实行公私合营扫平了障碍。

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运动当中，同仁堂股东经过帮助教育，在事实面前态度较好，交待清楚，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1953年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乐松生当时担任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北京市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乐松生欢欣鼓舞，他分别召集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工商业者开座谈会，学习、讨论总路线，同时有目的的征集工商业者的不同意见向上级反映，帮助上级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在一次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站起来高声地说：“新中国的成立给同仁堂带来了新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给同仁堂指明了方向。”乐松生平时发言都是稳稳当当的，这次在座的人都很吃惊，没想到他这次发言几乎是激动地喊出来的。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在乐家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股东们从各自的经历、各自的目的出发，态度也各有不同。当时乐氏家族和全国民族工商业者一样，总路线成了中心话题。1953年乐氏家族开了一个全体股东会议，这是个自发性的会议，没有组织，没有召集，没有主持。会上有人说：“我们不带这个头，看一看再说，谁先申请公私合营就叫谁先申请去！”有的说：“政府叫我们公私合营我们就公私合营，不主动申请。”当时南京同仁堂经理乐笃周也在北京，他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曾支援过八路军、解放军，他们向我宣传过党对民族工业商业政策，解放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说到做到。”

北京同仁堂股东之一，永仁堂药铺经理乐元可和夫人李铮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与李铮的表弟、中共党员杨宁和中共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张友恒经常接触，并经常提供帮助，李铮还负责掌管北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他们是我党的老朋友，在同仁堂公私合营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乐家会议上他们说：“北京一解放，组织上就安排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党的经济政策，我认识到党对